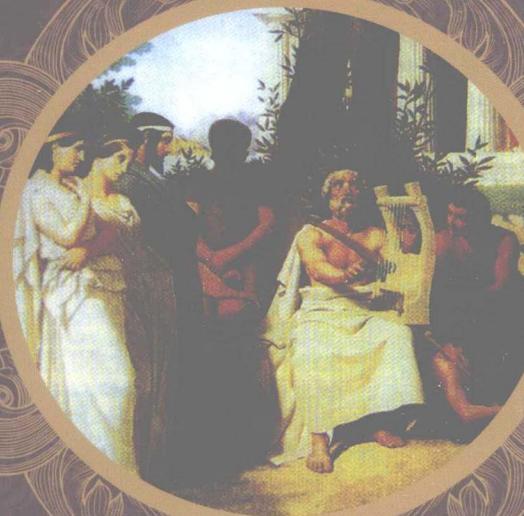


A HISTORY OF
WESTERN HISTORIOGRAPHY

主 编 张广智

本卷作者 吴晓群



西方史学通史

第二卷 古代时期

荷马时代至公元5世纪

Homeric Age ~ 5th Century

西方史学通史

第二卷 古代时期

荷马时代至公元5世纪

Homerica Age ~ 5th Century

主 编 张广智

本卷作者 吴晓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史学通史 第二卷 古代时期/张广智主编;吴晓群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309-08280-7

I. 西… II. ①张…②吴… III. 史学史-西方国家-古代 IV. K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44205 号

西方史学通史 第二卷 古代时期

张广智 主编 吴晓群 著
责任编辑/盛 亮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1.75 字数 339 千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8280-7/K · 342
定价: 4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导论 “关于各种历史的历史”： 西方古代史学的兴起

何谓“史学史”？普遍认为它是关于历史学这门学问的发生、发展及其特征的历史，这是对于史学史这一学科的一般性定义，若要论及史学史的特征及其研究意义，本人更倾向于认同英国当代思想史家、牛津大学欧洲思想史教授、英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约翰·布罗(John Burrow, 1935—2009年)的观点，他首先将史学史定义为“一部关于各种历史的历史”(A history of histories)以区别于“关于一种历史的历史”(The history of history)，然后又进一步指出：“一部关于各种历史的历史不会也不应该只是史家成就与优缺点的记录和归纳，也不单单是对史家所属学派及传统的描述和总结。它本身就是一个历史事业，是我们尝试了解过去的一种方式。”^①在这样的理解框架中，史学史的研究范畴就不仅限于表述史家们形成了什么思想，更要询问这些思想为什么会产生，史家与他所身处其中的历史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用美国当代思想史家唐纳德·R·凯利(Donald R. Kelley)的话来说就是：“文化是一个海洋，历史学家是这个海洋中的鱼，而不是海洋学家。”^②虽然我们无法如柯林伍德所言，在自己的心中重演过去。但我们必须清楚的是，历史叙述乃是当下语境中的产物。如法国年鉴学派的奠基人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 1886—1944年)所说的：“正如古老的阿拉伯谚语所言：‘与其说人如其父，不如说人酷似其时代。’无视这东方的智慧，历史研究就会失真。”^③

① John Burrow, *A History of Histories: Epics, Chronicles, Romances and Inquiries from Herodotus and Thucydides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Penguin Group, 2007, p. xix.

② [美]唐纳德·R·凯利：《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陈恒、宋立宏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前言第3页。

③ [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0页。

应该说,历史学从来就没有漠视有关自身发展的历史及其对自身历史的研究,然而,在过去很长的一个时间段里,史学史的研究多只是注意到了总结和评价史家的思想以及写史的风格与方式,虽然同时也都会提及史家生活的历史时代、社会环境,但仅仅是作为背景知识出现,而鲜有顾及史家心中的问题预设、史家及其著作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对史家本人及其历史书写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他们本身所具有的可能性和局限性、他们的期望和当时代读者的期望,等等。甚至有不少学者以今人的知识构架来看待古人,以现代的方式去猜度古典作家及其作品,从而难以就其自身的特点出发去理解古典著作。值得欣喜的是,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这一问题,并力图有所突破,本书也试图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在兼及各个阶段学术史之研究成果的同时,更注重考察古代史家当时所处的文化语境与时代需要对他们的考问,以此来讨论史家所面临的问题、希望以及他们可能做出的回应,在某种程度上将史家的历史书写理解为他们对自己那个特殊时代和社会面临之问题的一种解答。因此,本书就不只是研究历史著作是如何写成的,还要牵涉到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条件下的历史学家是如何解读那些事件的,以及他们历史研究的视角、方法,还有他们所采用的文本形式和话语结构等。那么,这么“一部关于各种历史的历史”也就成为了本研究者“尝试了解过去的一种方式”。我们相信,历史学家从来就不是书记员,他记录自己选择的主题,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他自己或读者的好奇心,史家组织材料的方式本身就反映了他及他那个时代的思想观念。任何一本著作,其形式本身也向读者暗示了某种阅读的策略和方向,而在随后的研究中,其自身同样也会变得富有意义。当然,要在这样一部带有史学通史性质的著作中做到对每一个史家的详细解读是很困难的,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本人所能做到的只是将这种认识贯穿在整个著述过程之中,特别是对这一时期那些重大历史学家的讨论中,然而更希望的是将这样的写作思路呈现在读者面前,以期能够对读者自己进一步的研读提供某种可能生发开去的途径和方法。

具体到本书所涉及的内容——西方古典史学,它包括古代希腊史学、古代罗马史学和古代犹太史学。以往,习惯上西方古典史学只包括希腊罗马的史学,不过近几十年来,西方学术界开始将古代犹太史学纳入西方古典史学的范畴,将古代希腊、罗马以及犹太共同视作是西方历史学起源与初步发

展的时期^①。基于这样的学术趋势，在本书中我们也尝试着将犹太史学放在整个西方古代史学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并将它与希腊罗马的史学传统进行对照和比较，以期加深对整个西方史学传统的理解和反思。事实上，西方史学固然深受古希腊史学的影响，但犹太史学的影响也不可低估。而且促使犹太史学与希腊史学形成的外部因素是相同的，即它们都是在本民族与外族的交流与对抗中形成的。尤其是在公元前5世纪，犹太与希腊同处在波斯帝国广袤的文化圈之中，这一文化圈对他们各自历史学的发展与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约瑟福斯在《犹太战争史》的序言中说：

我无意夸大自己同胞的英雄行为从而来贬低罗马的胜利，而是公正、准确地讲述史实。如果有人对我流露个人情感予以苛责，他必须明白史实终归是史实，而记录时的痛苦只有作者自己知道。……我决定尊重史实，写一部历史。……这是为那些热爱真相而不是寻求消遣的人写的。^②

这样的表述方式及其现存的希腊文版本都让后世的学者认为他所遵循的是修昔底德的史学路数^③，而他为罗马人的征服辩护并劝告犹太人放弃反抗的做法又让西方学者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位身处罗马世界的“外省人”^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犹太史学与希腊罗马史学就是一脉相承的，实际上，早期类似的外部环境并未使犹太史学与希腊史学走上同一条发展道路；从历史编纂学形成的时间上说，犹太史学早于希腊罗马史学；就双方使用的资料而言，犹太史学也远比希腊罗马史学丰富；而充满神意的历史对犹太人意义之重大也异于希腊罗马人。至于两者之间的异同我们将在具体的章节中论及，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犹太史学是能够纳入西方古代史学的传统和范畴之

^① 英国学者默里认为，历史学独立的形成于世界三大地区，即希腊、犹太和中国。参见：John Borardan, Jasper Griffin, Oswyn Murry,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Greece and Hellenistic World*, Oxford, 1991, p. 215。

^② 约瑟福斯：《犹太战争》，王丽丽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

^③ 参见：Menahem Stern, “Josephus and the Roman Empire as Reflected in the Jewish War”, in Louis H. Feldman and Gohel Hata Detroit eds., *Josephus, Judaism and Christianity*,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71–80, note 7。

^④ 约翰·布罗在论及约瑟福斯时就将他归在罗马史家之中，并将他的历史书写称作“行省的视角”，参见：John Burrow, *A History of Histories: Epics, Chronicles, Romances and Inquiries from Herodotus and Thucydides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pp. 147–156。

中的。

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历史叙述,是指人类对自身在过去发生的社会行为以及当时文化场景的描述。这不仅是古人在其特定时空下进行的一种社会实践,同时也应将其视作一种探寻智慧的方式,这是一种在时间上拓展人类视野并超越地方经验和注意力的形式。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古代历史书写的实践中,叙述的动机、形式、目的和标准都是从无到有的,因而必然显示出它的不成熟性与表现类型的多样性,这在希腊、罗马及犹太的史学中均有所体现。其不成熟性意味着我们不能以当今学科的严格标准来苛求于古代史学,而类型的多样性一方面表明它可能涵盖了后世的多种史学种类,另一方面则显现了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语境中动态发展的过程,这也恰好体现了史学所应有的特征,正如唐纳德·R·凯利所说的:“一个单独的、静止的定义是绝对非历史的,只有在不同的背景之下详尽地研究了历史的命运和用法之后,就像我在这里提出的,对历史术语和概念的理解才能得以实现。”^①

西方古代史学从神话到历史的过程,也是人类自我认识和发现的过程。那么,在西方史学的起源之时什么是历史学所寻求的且一直坚持的?应该说,实用与求真是历史学起源时最初的也是终极的目的。于是,我们看到,希罗多德的历史探究是为了让人类的丰功伟绩不致被遗忘,修昔底德是以历史来证明人性的永恒,波里比乌斯更是提出:历史是一门以事实为训的哲学,读史不仅能从中猎取知识,更能指导人们的实际行动。罗马史家们对历史的训导作用更是深信不疑,并将其发挥到极致,如老伽图坚信历史的目的就在于劝善惩恶;李维的历史实践着眼于整个罗马国家的存亡,意在通过颂扬先辈的精神,激励当时代的罗马人以确立未来的方向;塔西佗则体现出将历史的垂训作用与道德教育相结合的趋势;而这一趋势又为普鲁塔克、阿庇安等史家所继承发扬。犹太史家更是以史为鉴,告诫世人,因此对于约瑟福斯来说,证明上帝意志的不可更改性与说明罗马征服的不可抗拒性就是一致的。正如现代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1866—1952年)所说:“古代史学被人称为‘实用主义’的;在这个词的古代的和近代的双层意义上,它都是这样的:当它使自己局限于事情的世俗方

^① 凯利:《多面的历史》,第10页。

面尤其政治方面时,当它用反省和忠告装点它们时,它就是这样的。”^①这也就是说,古代希腊罗马史学的实用主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为政治上的借鉴,一为道德上的借鉴。在这些古代史家的历史书写中,对史实的求真与真实事件所透露出来的实用价值其实是相辅相成的,而这两者的结合实现了历史学的功用。

可以说,史学的求真与致用至今仍是现代史学存在的目的和基础。正是基于这一最根本的出发点,尽管古代史学与今天有着严格学科标准的历史学有着很多的不同之处,我们依然承认古代史学与现代史学之间的传承关系。然而,不管是希腊罗马史家还是犹太史家都不同程度地具有求真的意识,要求自己对历史事件进行客观的记载,但是由于古代史家是生活在一个口述的社会中,他们是在没有图书馆的条件下进行其历史著述的,口头证据始终是探究以往及当时事实与意义的主要途径,而口述的历史又对记忆有着很大的依赖,当然这种记忆更主要的是指一种集体意识层面上的记忆,它不只是一个个人单纯的记录或追溯的过程,更是作为一个团体在某种语义系统内纪念或熟记某种现象的方式。古代史家的任务之一便是尽可能地还原其当时的语义场景,以此将公众记忆保存下来,于是历史编纂便成为一种保存记忆的重要方式。当然,历史学家不是记录员,他同时还是一个智慧(真理)的探寻者,因此他必将公众记忆与他个人的兴趣和关注点结合在一起,他记录并解释了自己选择的变化,这些变化同时也是他那个时代某个团体共同关注点的事件,这样的历史叙述一方面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研究目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某个民族或团体保存并延续其传统的需要。此外,也由于早期史学的不成熟性,在古代史家的历史书写中,神意对历史中的作用虽然不再如神话历史中那样占据主导性的地位,但神意对历史的干涉在古代史家的著述中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人的历史仍与神意交织在一起,古代史家所表现出来的人文主义关怀并非如自近代文艺复兴以来所强调的那么纯粹和完全。换言之,由于古代史家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与我们的不同,他们所要处理的材料及其写作的方式与我们的不同,因此他们所追求的“真实”与现代史学中所强调的“客观”也就不是同一个概念,这是我们在进一步的讨论中所不能忘记的。

至于古代史学的关注点,虽然史家著述的种类很多,但主要内容大致有

^① [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56页。

两个方面：一是偏重记录当代或近代的事件。比如希罗多德重点写了希波战争史，它是发生在上一代人时间内的事件；修昔底德写了他当时代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关注他亲眼见证的斯巴达与底比斯的霸权（公元前404年—前362年）；波里比乌斯从第二次布匿战争写到他自己的时代。对近代和当代事件的偏爱也发生在罗马史家从撒路斯提乌斯、李维、塔西佗直到阿米安乌斯的身上。同样，约瑟福斯的第一部著作也是对发生在他那个时代的犹太战争的记载。可以说，在西方古典史学中，几乎所有“伟大的”历史学家都倾向于只写或主要写近当代史实。对此，20世纪的意大利史家阿纳尔多·莫米里亚诺（Arnaldo Momigliano，1908—1987年）的评价是：“偏重当代或近代的事件并将此作为史学主题的首要动机不是材料来源问题，也不是能盘问见证人或本身就是目击者所具有的显著优势。……正是当代或近代事件的重要性决定了主题之抉择。……材料来源的可靠性只是一个附加动机。……对当代史或近代史的阐释在古代社会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①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所有古代史家的所有著作都是对当代史的记载，因为无论是希罗多德还是修昔底德都曾在他们的书中追溯远古的历史，李维和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的作品都始于罗马建城时期，约瑟福斯也写作了关于犹太民族的上古史。我们只是想提请读者注意的是，即使是有这些对遥远过去的追述，但古代史家心目中对于当代的关注仍是第一位的，当代人写当代史仍被认为是最可靠且最具说服力的，也是最能够体现历史之真实性的。

西方古代史学的主要内容之二是史家大多在其著述中竭力反映他那个时代或古今时代之间的种种变化，莫米里亚诺说：“变化感支配着‘伟大的’希腊拉丁历史学家。……公元前6世纪以后的希腊人和前3世纪以后的罗马人都确凿无疑地感受到发生在他们周围的巨大变化。……这些历史学家在一种期待变化的氛围中开展工作，并记录下变化的事实。……历史著述在前5世纪的诞生几乎与民主制度在爱奥尼亚和雅典的胜利与由此而来的对变化的要求密不可分。……可以这样理解‘古典’史学（意即，希腊、罗马人眼中堪称经典的史学），它的最大特色在于它是反映变化的镜子。”^②除了

① [意]阿纳尔多·莫米里亚诺：《古典传统与古典历史学家》，宋立宏译，载《新史学》第一辑《古典传统与价值创造》，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1页。

② 同上书，第13页。

希腊罗马的史家以外，犹太史家从申命派史家到约瑟福斯也都在不断关注着本民族历史进程中的各种变化。所有这些“反映变化的古典史家绝不是对个别城邦或国家的研究，而是关注包括众多国家、地区，甚至若干帝国在内的发展和变化”^①。可以说，无论是与异族的战争还是内部的冲突、制度的变化都吸引着古代历史学家的目光，他们的史书中充满了这种变化感，同时也弥漫着由种种的变化而生发出来的各种反思。因此，其历史著述的行为便是为了教会人们如何应对这些变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家反复坚持自己要写的事件格外重大、格外重要，这意味着他认为那种变化也许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可以提供的教训是怎样面对变化”^②。于是，古代史家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大千世界，变化无穷，而这又与他们的视域与眼光紧密联系，我们看到，希罗多德的《历史》是他那个时代希腊人所知世界的“世界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虽为专门史，但作者独具慧眼，将延绵 27 年、中经议和间歇、又分散各地的战争视为一个整体，可见其所具有的宽广眼光；波里比乌斯的《通史》更具“世界主义”的眼光，他还试图寻求世界历史的有机联系及历史变动的整体性。波里比乌斯的宏观视野标志着西方古典史学的重大进展；李维的《建城以来史》也堪称一部综合性的通史著作。现今，风行西方的全球史观，或许也可以在这里寻找到它的源头。

至于古代史家在对过去及其当代的历史书写中是如何保持其真实性和可靠性的，他们又是在何种文化语境及范围内被视作“历史学家”的，我们会在具体的章节中加以讨论，此处不赘。

① [意]阿纳尔多·莫米里亚诺：《古典传统与古典历史学家》，宋立宏译，载《新史学》第一辑《古典传统与价值创造》，第 15 页。

② 同上书，第 16 页。

目 录

导论 “关于各种历史的历史”: 西方古代史学的兴起 1

上编 希腊史学

第一章 从史诗到散文纪事	11
一、神话与史诗	13
二、赫西俄德的谱系学	24
三、散文写作的开始	28
第二章 希罗多德:“史学之父”与“谎言之父”	31
一、希罗多德的生平与著作	31
二、希罗多德的历史书写	39
三、《历史》的真实性问题	49
四、城邦语境中的“历史”叙述	56
第三章 修昔底德:“科学的”与“修辞的”历史学家	66
一、修昔底德的生平与著作	66
二、修昔底德史学的功能:“科学的”抑或“修辞的”	80
三、两种不同的史学范式	98
第四章 色诺芬:“阿提卡的蜜蜂”	102
一、生平及其政治立场	102
二、修昔底德的继承者抑或缺乏才华的平庸史家	103
三、丰富的阅历、多产的作家	111

第五章 希腊化时代的历史学家	118
一、多样的历史叙述	118
二、修辞学派的兴起及其对史学的影响	122
三、波里比乌斯：“历史学家中的历史学家”	126

中编 罗马史学

第六章 罗马史学的传统以及希腊的影响	143
一、罗马史学的开始	145
二、希腊化风格对罗马史学的影响	150
三、罗马史学的传统及其特征	153
第七章 共和国时期的罗马史学	158
一、老伽图：“政治史学”的奠基人	158
二、恺撒：作为历史学家的贡献	164
三、撒路斯提乌斯：“罗马的修昔底德”	174
第八章 帝国早期的史学	183
一、李维：罗马精神的缔造者	183
二、塔西佗：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	195
三、苏维托尼乌斯：为帝王立传的书生	210
第九章 帝国治下的希腊史家	216
一、希腊史家的群像	216
二、普鲁塔克与传记史学	220
三、阿庇安：“纪事本末体”的创始者	229
四、阿里安：仅为一人作传的史家	236
五、卡西乌斯·狄奥：称赞帝制的希腊裔史家	243

六、阿米安乌斯：最后一位古典史家	247
下编 犹太史学	
第十章 犹太史学的滥觞及其历史进程	257
一、犹太民族的形成及早期历史	257
二、犹太史学的范畴	266
第十一章 约瑟福斯：第一位引起非犹太世界注意的犹太史家	274
一、生平与著作	274
二、反犹语境中的反击	280
三、写作方式及历史观	285
第十二章 犹太史学的特征：充满神意的历史	295
一、救赎的历史	295
二、历史的神话化与神话的历史化	301
结语 历史的建构：西方古代史学的特征	306
一、口述的传统与记忆的史学	307
二、集体记忆与古代史家所追求的“真实”	310
三、人的历史与神意的交织	314
四、古代的历史学与修辞学	318
五、真实的历史与记录的历史	322
参考书目	328

导论 “关于各种历史的历史”： 西方古代史学的兴起

何谓“史学史”？普遍认为它是关于历史学这门学间发生、发展及其特征的历史，这是对于史学史这一学科的一般性定义，若要论及史学史的特征及其研究意义，本人更倾向于认同英国当代思想史家、牛津大学欧洲思想史教授、英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约翰·布罗(John Burrow, 1935—2009年)的观点，他首先将史学史定义为“一部关于各种历史的历史”(A history of histories)以区别于“关于一种历史的历史”(The history of history)，然后又进一步指出：“一部关于各种历史的历史不会也不应该只是史家成就与优缺点的记录和归纳，也不单单是对史家所属学派及传统的描述和总结。它本身就是一个历史事业，是我们尝试了解过去的一种方式。”^①在这样的理解框架中，史学史的研究范畴就不仅限于表述史家们形成了什么思想，更要询问这些思想为什么会产生，史家与他所身处其中的历史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用美国当代思想史家唐纳德·R·凯利(Donald R. Kelley)的话来说就是：“文化是一个海洋，历史学家是这个海洋中的鱼，而不是海洋学家。”^②虽然我们无法如柯林伍德所言，在自己的心中重演过去。但我们必须清楚的是，历史叙述乃是当下语境中的产物。如法国年鉴学派的奠基人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 1886—1944年)所说的：“正如古老的阿拉伯谚语所言：‘与其说人如其父，不如说人酷似其时代。’无视这东方的智慧，历史研究就会失真。”^③

① John Burrow, *A History of Histories: Epics, Chronicles, Romances and Inquiries from Herodotus and Thucydides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Penguin Group, 2007, p. xix.

② [美] 唐纳德·R·凯利：《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陈恒、宋立宏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前言第3页。

③ [法]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0页。

应该说,历史学从来就没有漠视有关自身发展的历史及其对自身历史的研究,然而,在过去很长的一个时间段里,史学史的研究多只是注意到了总结和评价史家的思想以及写史的风格与方式,虽然同时也都会提及史家生活的历史时代、社会环境,但仅仅是作为背景知识出现,而鲜有顾及史家心中的问题预设、史家及其著作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对史家本人及其历史书写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他们本身所具有的可能性和局限性、他们的期望和当时代读者的期望,等等。甚至有不少学者以今人的知识构架来看待古人,以现代的方式去猜度古典作家及其作品,从而难以就其自身的特点出发去理解古典著作。值得欣喜的是,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这一问题,并力图有所突破,本书也试图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在兼及各个阶段学术史之研究成果的同时,更注重考察古代史家当时所处的文化语境与时代需要对他们的考问,以此来讨论史家所面临的问题、希望以及他们可能做出的回应,在某种程度上将史家的历史书写理解为他们对自己那个特殊时代和社会面临之问题的一种解答。因此,本书就不只是研究历史著作是如何写成的,还要牵涉到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条件下的历史学家是如何解读那些事件的,以及他们历史研究的视角、方法,还有他们所采用的文本形式和话语结构等。那么,这么“一部关于各种历史的历史”也就成为了本研究者“尝试了解过去的一种方式”。我们相信,历史学家从来就不是书记员,他记录自己选择的主题,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他自己或读者的好奇心,史家组织材料的方式本身就反映了他及他那个时代的思想观念。任何一本著作,其形式本身也向读者暗示了某种阅读的策略和方向,而在随后的研究中,其自身同样也会变得富有意义。当然,要在这样一部带有史学通史性质的著作中做到对每一个史家的详细解读是很困难的,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本人所能做到的只是将这种认识贯穿在整个著述过程之中,特别是对这一时期那些重大历史学家的讨论中,然而更希望的是将这样的写作思路呈现在读者面前,以期能够对读者自己进一步的研读提供某种可能生发开去的途径和方法。

具体到本书所涉及的内容——西方古典史学,它包括古代希腊史学、古代罗马史学和古代犹太史学。以往,习惯上西方古典史学只包括希腊罗马的史学,不过近几十年来,西方学术界开始将古代犹太史学纳入西方古典史学的范畴,将古代希腊、罗马以及犹太共同视作是西方历史学起源与初步发

展的时期^①。基于这样的学术趋势,在本书中我们也尝试着将犹太史学放在整个西方古代史学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并将它与希腊罗马的史学传统进行对照和比较,以期加深对整个西方史学传统的理解和反思。事实上,西方史学固然深受古希腊史学的影响,但犹太史学的影响也不可低估。而且促使犹太史学与希腊史学形成的外部因素是相同的,即它们都是在本民族与外族的交流与对抗中形成的。尤其是在公元前5世纪,犹太与希腊同处在波斯帝国广袤的文化圈之中,这一文化圈对他们各自历史学的发展与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约瑟福斯在《犹太战争史》的序言中说:

我无意夸自己同胞的英雄行为从而来贬低罗马的胜利,而是公正、准确地讲述史实。如果有人对我流露个人情感予以苛责,他必须明白史实终归是史实,而记录时的痛苦只有作者自己知道。……我决定尊重史实,写一部历史。……这是为那些热爱真相而不是寻求消遣的人写的。^②

这样的表述方式及其现存的希腊文版本都让后世的学者认为他所遵循的是修昔底德的史学路数^③,而他为罗马人的征服辩护并劝告犹太人放弃反抗的做法又让西方学者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位身处罗马世界的“外省人”^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犹太史学与希腊罗马史学就是一脉相承的,实际上,早期类似的外部环境并未使犹太史学与希腊史学走上同一条发展道路;从历史编纂学形成的时间上说,犹太史学早于希腊罗马史学;就双方使用的资料而言,犹太史学也远比希腊罗马史学丰富;而充满神意的历史对犹太人意义之重大也异于希腊罗马人。至于两者之间的异同我们将在具体的章节中论及,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犹太史学是能够纳入西方古代史学的传统和范畴之

^① 英国学者默里认为,历史学独立的形成于世界三大地区,即希腊、犹太和中国。参见: John Borardan, Jasper Griffin, Oswyn Murry,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Greece and Hellenistic World*, Oxford, 1991, p. 215。

^② 约瑟福斯:《犹太战争》,王丽丽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

^③ 参见: Menahem Stern, “Josephus and the Roman Empire as Reflected in the Jewish War”, in Louis H. Feldman and Gohel Hata Detroit eds., *Josephus, Judaism and Christianity*,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71–80, note 7。

^④ 约翰·布罗在论及约瑟福斯时就将他归在罗马史家之中,并将他的历史书写称作“行省的视角”,参见: John Burrow, *A History of Histories: Epics, Chronicles, Romances and Inquiries from Herodotus and Thucydides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pp. 147–156。

中的。

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历史叙述,是指人类对自身在过去发生的社会行为以及当时文化场景的描述。这不仅是古人在其特定时空下进行的一种社会实践,同时也应将其视作一种探寻智慧的方式,这是一种在时间上拓展人类视野并超越地方经验和注意力的形式。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古代历史书写的实践中,叙述的动机、形式、目的和标准都是从无到有的,因而必然显示出它的不成熟性与表现类型的多样性,这在希腊、罗马及犹太的史学中均有所体现。其不成熟性意味着我们不能以当今学科的严格标准来苛求于古代史学,而类型的多样性一方面表明它可能涵盖了后世的多种史学种类,另一方面则显现了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语境中动态发展的过程,这也恰好体现了史学所应有的特征,正如唐纳德·R·凯利所说的:“一个单独的、静止的定义是绝对非历史的,只有在不同的背景之下详尽地研究了历史的命运和用法之后,就像我在这里提出的,对历史术语和概念的理解才能得以实现。”^①

西方古代史学从神话到历史的过程,也是人类自我认识和发现的过程。那么,在西方史学的起源之时什么是历史学所寻求的且一直坚持的?应该说,实用与求真是历史学起源时最初的也是终极的目的。于是,我们看到,希罗多德的历史探究是为了让人类的丰功伟绩不致被遗忘,修昔底德是以历史来证明人性的永恒,波里比乌斯更是提出:历史是一门以事实为训的哲学,读史不仅能从中猎取知识,更能指导人们的实际行动。罗马史家们对历史的训导作用更是深信不疑,并将其发挥到极致,如老伽图坚信历史的目的就在于劝善惩恶;李维的历史实践着眼于整个罗马国家的存亡,意在通过颂扬先辈的精神,激励当时代的罗马人以确立未来的方向;塔西佗则体现出将历史的垂训作用与道德教育相结合的趋势;而这一趋势又为普鲁塔克、阿庇安等史家所继承发扬。犹太史家更是以史为鉴,告诫世人,因此对于约瑟福斯来说,证明上帝意志的不可更改性与说明罗马征服的不可抗拒性就是一致的。正如现代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1866—1952年)所说:“古代史学被人称为‘实用主义’的;在这个词的古代的和近代的双层意义上,它都是这样的:当它使自己局限于事情的世俗方

^① 凯利:《多面的历史》,第10页。